

五华古镇华城

张泉清

华城（原名长乐）之为镇，始于宋天禧二年（1018年），距今已有九百六十七年。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置长乐县，设县治于长乐镇。民国三年（1914年）改县名为五华，从此该镇易名为华城镇。华城自建镇九百多年时间，除宋绍兴十九年至元至元廿九年（1149——1292）的143年间迁县治于九龙岗外，华城镇为五华县治有七百四十一年。历史悠久，为我县最古老的城镇，也是我县最早、最久的县治之地。解放后，1954年又迁县治于水寨。

华城镇设县治之初，县署设在城隍庙左侧（今中山公园右侧）。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因洪水为灾，县署崩圯，知县蒋鸣庆以暂借金山书院（现五华中学内）办公。自是以来，金山书院遂为全县县治之所，入民国改为县署。该镇于明洪武廿一年（1384年）由知县陈坚开始筑城，至清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历经165年，断断续续修建成城池。全城周长一千零五十九丈，城高二丈五，城墙上二十九座炮楼，一千四百二十五个垛口。设四门，东叫阳春门，西叫清元门，南叫宁海门，北叫肃岭门。环城有宽九尺，深七尺的环城沟，常年盈水。

华城镇因长期为县治之地，自明清以来，城镇内外，

宫、亭、殿、庙、祠林立。计有城内的学宫、城隍庙、乡贤祠、节孝祠、崇义祠、二公祠、万寿宫、福寿庙；城外有东岳庙、玉皇殿、观音堂、大雄宝殿、先师庙、地庄庵、真武殿、关岳庙、晏公庙、天妃庙、华光庙、奎文阁、禅定寺、西云寺、却金亭和宗祠共七十多座。这些古建筑结构大方、美观、庄重。有的雕龙画凤，古香古色；有的是殿中有殿、殿中有宫，五光十色，别有洞天；有的摆设有五华石工精湛雕刻的“石马”、“石狮”、“石鹿”、“海上日出”石雕，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这些建筑富有民族风格，是先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但是，由于历史的变化，大部分寺庙已废，只有学宫较为完整，现已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华城自筑城之初，只有通向四门的十字街。由于它是当时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邮电、文化卫生事业也比较发达。从明洪武五年（1371年），该镇为兴宁“驿”站，县前马信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首办县邮电局，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设电报业务。水路交通有岐岭、潭下两河相交，均有民船往返，通韩江嘉应州接连汕头等地；陆路亦是纵横相交，为兴、龙、紫三条公路的交叉点，穗汕线通过此镇。由于交通方便，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不断扩建商店街道。到民国期间，全镇已有南门街、太平街、襟带街、伞里街、财兴街、水巷街、水巷横（四方井）街、奎阁街、河唇街、新罗桥街、东山街、和华侨李桂和、张子良建有桂和街、子良街等，有大小商行，店铺千余间。抗日战争时期，却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四次出动飞机狂轰

滥炸，街道、店铺、寺、庙均受到破坏，桂和街被炸毁店铺四十多间，仅1939年农历九月十八日就被敌机炸死居民五人。

该镇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全县之先河。洪武八年（1375年）开设“社学”，东城门有“居仁”，西城门有“由义”南城门有“立礼”，北城门有“秉智”。乾隆二十年（1755年）知县戴琪建金山书院。到了光绪二十八、九年间，受康梁维新变法影响，废科举、兴新学，在学宫开办第一期师范传习所，光绪三十三年改设初等模范小学。宣统三年，知县于祖谦改办为长乐官立中学堂，民国三年，随县名更为五华县立中学校。民国十三年（1924年）又于城南黄塘岭山下开办私立乐贤初级中学，接着开办乐贤附小一间。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学宫开设华城镇国民中心学校，招收全县和各县的学生就读。到1948年秋，该镇的中小學生共有1800多人。

古老的华城镇，在历史上曾几次受到革命风暴的洗礼。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五华农民领袖李正春响应太平天国运动，率领农民军攻进长乐城（华城），杀知县荣桂，开牢房，放囚徒，开钱库、粮仓，赈济贫民，震撼了封建统治的根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和抗日期间，五华一中学生为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抵制日货，上街搜查“洋货”，公开焚烧。1925年3月，周恩来同志率领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一次东征，征讨陈炯明逆军，于三月十七日进占华城，住在五华一中学校，并成立国民党五华县党部筹备委员会，组织“新学生社”，组织工会、农会、商民协会，召开各界代表

会，推选新县长温其藩和惩罚贪赃枉法的劣绅。1926年元月，无产阶级革命家古大存同志在华城领导工会、农会工作，全县农民运动如火如荼。1949年5月，粤赣湘东二支第四团在张日和同志率领下，解放了五华，举行了进城仪式，华城居民和附近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从此，华城结束了封建统治，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解放后，华城人民在中共五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疏理了乌坡河，加固了歧岭河华城段河堤，综合治理圩镇、街道、店铺，把常被洪水为害的华城镇，变成了花果飘香的鱼米之乡。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方针的指引下，更是商业兴旺，贸易繁盛。在城东、城南和乌坡河一带，新街道、商场、店铺、楼房拔地而起，开戏院，设医院，扩建五华中学、华西中学，增办了附城的维新小学、幼儿园，就读的学生已有四、五千人（比解放前增加二倍），为建设新的华城镇而迈步前进。

古老的华城，有欢度新春佳节的民俗外，还有它独有的习俗：

（一）三月三：自明清以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相传是天妃娘娘生日，俗称三月三。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自然科学不发达，相传天妃是通海之女神，有呼风唤雨之术，农民为求丰收，故华城镇在“三月三”，抬着天妃娘娘，在旗鼓、巡牌、高灯、竹彩和“金童玉女”、“仙女散花”、

“天姑乘鹤”多姿多采的古士衬偕下出巡，那天，全城采花街，装扮一新。街道悬挂布幕，结彩张灯，店里店外，街头

巷角，灯红花烂。各街各巷敲锣打鼓迎接。入夜，在天妃庙前戏棚聘请戏班演戏，吸引着四乡群众拥入城镇。这一天，华城镇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热闹非常。家家户户办起节日盛餐，迎接亲朋，故有“三月三，穿白衫，有钱无钱街上尖（串）”之说。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达，人们对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认识到风调雨顺，夺得丰收，不是依赖天妃娘娘的法术，而是靠科学，靠人力胜天。因此，解放后对习俗“三月三”有些改革，除保留彩花街外，以球赛、放电影、演戏等新形式所代替。

（二）山歌醮会：离华城约五里有一座狮雄塔，有山有水，风景优美。明清时代，每逢中元节前后，从农历七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在狮雄山塔举办醮会。民国期间改为五年一醮。醮会期间，除在祖先宫殿设坛祭祖外，大摆山歌擂台，各地优秀歌手纷纷登上塔顶作为台主，跟四方歌手们大赛客家山歌。届时，不但本县各乡群众踊跃赴会，就连龙川、紫金、兴宁等县群众也纷纷赶来参加。一连六天六夜，数万群众汇聚在狮雄山上，人潮滚滚，歌声不断。解放后，随着山歌普及，到处可听到山歌演唱，山歌醮会而消声匿迹了。

（三）中秋赛灯：华城镇居民在中秋之夜，以月饼赏月外，还分别在南门城墙和乌坡河堤，赛考灯火。是时，各以罐碟或竹筒灌上油，以透明的红、黄、青、蓝色纸罩住，摆出五光十色的灯火阵。在锣鼓喧天、海螺嘟嘟助兴下，开展

灯火比赛，相互用灯火摆字或对联。如一方摆出“南国称雄”，另一方则摆“天下无敌”，一方摆出“南风拂动，天雀敛羽”，另方则摆“天雷震撼，南燕惊飞”。几个回合，然后放鞭炮，敲锣打鼓，直到天亮，欢乐而散。

古老的华城镇，还有其闻名遐迩的特产，华城小窖塘荔枝，有三百年历史，以核小，肉厚，汁多的特点，远销汕头、潮州、老隆、南洋等地，故有华城“荔枝湾”之称。

五华酿豆腐，向以华城称著，解放前后，又以“斗记”为佳，名传东江、潮梅一带。凡经华城的外地人，以品尝华城酿豆腐为快。笔者曾在解放初期，特登门“斗记”，品尝酿豆腐，由于制作精细，讲究，具有“咸、烧、肥、香、滑”的特色，别有一番风味，名不虚传。

华城，现仍在不断发展和建设中。

安流镇来历及发展概况

张映乾

安流镇，从前叫横流渡。据说因河流改道，江水横流而得名。起初这里是人们来往的横流渡口。在清朝顺治初年，当地百姓在这渡口用竹木搭成几间小店，日子久了，店铺增多，但还是“一间点灯三间亮”的竹蓬店，亦成为附近村民的小集市。到清朝末年才逐渐建有水街、米街、中心街、上下横街的横流渡圩。那时，圩头有个渡口，设有木桥，只有蓬船往返，交通很不方便，惨淡经营，土产土销。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各系军阀割据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农村破产，世风日下，当时的横流渡，民无安日，人们归咎于地方称“横”，从此，便将含义不祥的横流圩改为安流圩，沿用至今。

安流圩，在清代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于周、琴、棉三江汇合处，开设三江书院。清末戊戌维新运动，废科举，立新学，三江书院改为三江高等小学。1922年继在该校开办三江初级中学（附设高等小学）。1925年3月，东征军到了安流，周恩来、蒋介石曾住在三江中学。周恩来同志并在该校宣传东征的意义和东征军纪律，而使學生受到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1929年春，三江中学改为县立初级第三中

学。1936年11月开办福全小学。1943年初级第三中学增设高中部，为我县较早的完全中学之一。解放后，县立三中易名为安流中学，福全小学也更名安流小学了。

1925年间，由于东征军两次到了安流，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兴起。同年四月，曾毕业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魏宗元回到梅林、龙村、安流等地组织农会，并在安流东灵寺成立了县农民协会。那时，安流成为上山十二约的政治中心，生机勃勃，民风好转，呈现一派新的景象。

抗战初期，开辟了安流至河婆公路，贯穿潮汕、兴梅一带。由于交通方便，商贾云集，开铺设店、扩建有新街、河唇街、司前街、青江街；增设百货、布匹、药材行业，特别是安流的各式锅鼎，闻名遐迩，远销外地。有一年，安流圩建醮，同发生锅鼎店的对联，描述了锅鼎行业的盛况。其对联是：

同阵到安流，很多趣味，请看了新街水街米街中心街上下横街，通街建醮，热闹非常，念佛念经念弥陀一般习惯。

发生这文鼎，虽属便用，究不若糖锅龙锅家锅九州锅大小深锅，各锅驰名，销售极广，利人利己利天下万宝来朝。

抗日战争期间，安流镇的中心街建有火力发电厂，供商店照明。汕头沦陷后，汕头经梅县到江西一带的盐路被割断，海陆丰的水产、食盐，甚至美国支援抗日的军火都改道由汕尾、海陆丰经葵头嶂、棉洋过安流运往内地。因公路毁坏，这些物资全靠肩挑，抬运，因此往返于安流的人群，络绎不绝，日寇便于1941年4月出动飞机轰炸安流，死伤数十

人。日寇的暴行更激起群众的抗日热潮。当时安流镇有三年一醮的习俗，那年醮台上的对联，都以宣传抗日，同仇敌忾。现选录二联，以见当年情景。

其一是：抗日正艰危请诸天神佛亦要全体动员 为民杀敌。

胜利已在望愿十方善信多节一些资力 报国献金。

其二是：痛暴日破坏和平捣乱东亚激起人神同忿懣。

愿菩提扶持正义扫荡丑类发扬党国大权威。

1949年3月，闽粤赣边纵二支队解放了安流，成立揭陆华边行政委员会。1950年3月，行政委员会撤消，归五华县管辖。解放后，安流发展更快了。1951年修筑各线公路；1952年兴建横架琴江两岸大木桥，建安流礼堂，粮仓；1971年改木桥为水泥大桥，综合治理街道。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兴建街道，楼房高耸，商业兴旺，圩镇繁荣，成为潮汕、揭阳、丰顺、普宁、海丰、陆丰、惠阳、紫金、龙川、揭西、兴梅等十多个县的集市贸易场所。同时，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提高人们科学文化水平，开设电影院，扩建安流中学和安流小学，每年招收三千左右的学生，为国家培育人才

安流镇，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下，将建设得更加美好。

水打郭田圩及其民间传说、

廖传扬 李木乃

郭田圩位于鸿图嶂下十多华里的郭田河畔。它何朝何代建圩，无史可查。由于郭田圩是当时通往兴宁、梅县、丰顺、汕头的一个主要落脚点，做生意、走江湖、挑盐担的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并且经常有不少人在郭田圩投宿。因此，小小郭田圩，也曾经出现过畸形的繁荣和热闹。

据前清举人温训编纂的“长乐县志”记载：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476年）五月十九夜。北风，大水，坏禾，郭田圩店舍、民房俱崩，死者二百余人。而成为郭田圩特大的自然灾害。

由于年代久远，人们认识自然的历史局限，关于这次灾害，众说纷纭，演变成一个离奇曲折的神话故事。现搜集整理成文，以饷读者。

传说有雌雄两蟒蛇在鸿图嶂下的龙潭洞修炼了几百年，成了蛇精。它们来无影，去无踪，呼风唤雨，飞沙走石，当地人把它们尊为“蛇仙”，供品不断，香火不绝。于是，它们更加恣意玩乐，全忘了修炼正果的宗旨。有一年，西天佛祖传令东海龙王转告所有的山精水怪，凡未经晋级考核者，

务必在当年的八月中秋节前到龙宫会试，如能考中可成仙。雌雄两蟒得知消息后，着实慌乱。怎么办呢？眼看考期已到，所习经典大半夹生。倒是雄蟒自作聪明，打算带些土特产品，去打通关节，收买一下主考官，蒙混过关。雌蟒一听却道：“人间才有这种陈规陋习，龙王是水族之主，未必赏脸，别招惹是非”。雄蟒蛇道：“唉！你真是孤陋寡闻，愚昧之见。唐僧往西天取经，无钱行贿，阿傩、伽叶竟敢把无字之经交给他们师徒。最后，还不是送了化缘的紫金钵才算了事。”雌蟒蛇拗不过，便和雄蟒蛇一起搜罗了鸿图嶂上的最珍贵的山货，打点成叠，分别捆在各自的背上，选择在八月十五下午未时动身。至时，它们吞云吐雾，呼风唤雨，霎时间，鸿图嶂周围下起了倾盆大雨。黄昏前后，山洪暴发，河水猛涨。两条蟒蛇看看时候已到，立刻相约冲出龙潭洞，沿着滔滔浊水，顺流而下，翻波卷浪，河水顿时上涨了数尺。游了一段水路以后，雄蟒蛇不见雌蟒蛇，便立刻将尾巴往岸边的老榕树一卷，等等雌蟒，谁知这一卷，竟把整条榕树卷落河中，加上雄蟒蛇又粗又长的身体捆满了土特产品，不到一刻钟，河道被堵，江水骤涨，郭田圩竟成了汪洋泽国，淹死了数以百计的平民商贾。

这件事，早被东海龙王的细作探知，龙王一听大怒，为了惩罚它们，取消了它们的会试资格，并把它们带来的土特产品付之一炬，责令它们返回原籍，继续修练。同时，派蚌大姐随同它们到郭田圩安抚百姓，做好善后工作，以赎害民之过。

现在鸿图嶂下的芹碛湖，还有一个又长又深的山洞。据说，这个山洞就是当年雌雄两蟒蛇盘踞修练的地方。

事隔二百多年的今天，郭田圩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勤劳的郭田人民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先后在郭田河畔兴建了商店、粮所、医院、学校和水电站，平坦的公路从县城一直通到郭田圩。一座别致的花岗岩拱桥，横跨在郭田河上。海拔一千多米的鸿图嶂顶，省电视塔高耸入云，每晚向粤东各地转播新闻和文艺节目。此外，县里还在鸿图嶂下兴建了库容八百万立方米的三渡水水库，昔日吞噬了不少生命财产的郭田河也已被人民所征服。郭田人民正满怀信心地为把郭田建设得更加繁荣美好而奋发努力。

邓 文 钊

邓文钊，是五华县大坝区七都围人。生于一九〇八年，世居香港，从小在香港读书，留学英国，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得经济硕士学位。毕业后，在香港金融业工作。曾任香港大英银行华人经理，香港华比银行华人副经理。解放后，历任广东省商业厅副厅长、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省侨委副主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广东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省副省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于一九七一年逝世，享年六十有三。

邓文钊同志是一个充满民族正义感的抗日爱国工商界人士，他的一生是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奋斗的一生。不论在解放前和解放后，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忠实可靠的朋友，他的功绩，将永远受到后人的敬仰。为了使广大群众了解他的事迹，我们刊登“矢志不移跟党走”一文。

五华县文史办公室。

矢志不移跟党走

——悼念邓文钊同志

郭稼活 陈祖沛 刁绍芬 陈子彬 陈君冷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邓文钊同志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1971年他不幸离开了人间。岁月如流，九个春秋过去了，但如今大家一直都很想念他。他那种爱国的热忱，那种坚定不移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以及他在解放前和解放后为党为人民所做下的许许多多的好事，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坎，激励着我们在新长征中为四化更好做出贡献。

邓文钊同志从小生长在香港的一个有社会地位的资产阶级家里，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并得经济系硕士衔头。但他早年就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1936年他对斯诺关于陕甘宁边区访问的通讯报道就很感动。一九三七年，廖承志同志到了香港，与邓彼此过从甚密。由于党的教育，使他逐步认识了祖国外遭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内受国民党反动派腐败统治的苦难，认识了要推翻“三座大山”，救民救国，只有寄希

望于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了，举国人民同仇敌忾，广大海外侨胞纷纷出钱出力，共赴国难，邓文钊同志的爱国热忱越来越高涨，他不顾自己的身世，不避风险毅然接受党的委托，以自己在香港经营的崇德堂进出口庄作为八路军办事处的通讯站和接受华侨抗日捐献的联络站，接受和转运爱国华侨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和物资。他还参加了宋庆龄同志在香港主持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任司库，日夜为募捐筹集抗日军费而操劳，为抗日救国而尽力。缅怀邓老，人们特别不会忘记他协助党创办《华商报》的功绩。那是在1938年，正当抗日战争的第二年头，蒋介石消极抗日，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深入敌后，组织抗日民主政权，发动敌后游击战，牵制了大批侵华日军。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便对蒋介石采取诱降政策，妄图联合蒋介石消灭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力量。美英帝国主义也加紧玩弄“东方慕尼黑”阴谋，梦想牺牲中国。国家民族正处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了在华南地区和海外，揭露国民党当局卖国投敌，企图扼杀抗日民主力量的罪恶阴谋，宣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张，党于1941年初决定在香港创办《华商报》。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在香港办报谈何容易！港英当局规定，报社一定要由一位有社会地位的人当报纸的“法人”，否则就不给注册。在这关键时刻，邓文钊同志挺身而出，勇负重任。《华商报》于是与世见面了。但可惜的是出版之后，香港就沦陷了，《华商报》也被迫停刊。但邓文钊矢志

不移跟党走，辗转到了解放区、和党患难与共，风雨同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全国人民满怀喜悦，渴望和平建国。但岂料蒋介石集团背信弃义，撕毁重庆谈判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根据当时的形势，毛主席曾打电报嘱咐中共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同志，要设法占领广州、香港的宣传阵地，尹林平同志决定《华商报》要复刊。根据党的委托，文钊同志又作了种种努力，继续出面担任督印人、董事长等职，使得在国共谈判破裂，重庆《新华日报》被迫停刊，人民迫切需要听到党的声音的重要时刻，《华商报》又胜利复刊了。它肩负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宣传我党方针、政策，动员群众，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重任，成为我党在华南地区的战斗号角。邓文钊同志对《华商报》的支持和所作出的宝贵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怀的。

1949年冬，邓文钊同志不仅出面当了《华商报》的负责人，掩蔽党，而且在报社里还做了许多工作：如广州刚解放，解放军要进军西南，需要大量汽油，叶剑英同志从赣州急电要华南党组织设法解决。当时邓文钊同志在香港便千方百计利用他的一切关系，协助党组织抢运大批汽油回广州，及时支援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1950年春，广东缺粮，叶剑英同志要求党中央拨发外汇，进口八万吨大米，以接济广东及支援部队解放海南岛。他又协助党出面与泰国华侨代表进行谈判，使顺利签订了合同，及时从泰国运进七万吨大米，支援解放海南岛。

二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高高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邓文钊同志当时在香港，他和许多同志们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欢欣鼓舞。他积极协助党组织港澳工商界人士参观团，前往北京观光，向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副总理表达了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乐意回国投资参加祖国建设的心愿。这种爱国行动，得到周总理、国务院的嘉许。不久，邓文钊同志就带头与费彝民、王宽诚、何贤、马万祺、陈君冷、陈国泉、陈祖沛及归国侨领司徒美堂、陈其尤、黄长水、蚁美厚等知名人士联名发起集资，从香港回到广州创办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邓文钊同志被推选担任董事长。

“企业”的创办，不仅吸引了一部分港澳、华侨工商界人士回穗参加祖国经济建设，而且鼓舞了我省的广大工商业者坚决留在本省，在共产党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华南企业公司开办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了社会主义的经营方针，业务很快得到发展。它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促进城乡、内外物资交流，都起了良好的积极作用。解放初，我省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为了帮助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华企”还制定了“以商养工”的方针，把它从经营商业外贸所得利润尽量用于工业建设的投资。如今，大家所熟知的南方针织厂、东莞粉厂、徐闻和清远的糖厂、信宜松香加工厂等，就是当年华企投资逐步发展起来的，也正是“华企”所起的好的影响。之后，一批爱国华侨工商界又从海外集资来